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

赵欢春

【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一构想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超越西方媒体和思想界的议题设置，用彻底的唯物史观作为武器批判和回应逆全球化思潮。伟大战略才能赢得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战略意义在于，为防范化解国际关系重大风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重要遵循。具体来讲，它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积极应对世界变局，争取世界光明未来；它提炼“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为世界和平发展凝聚共识；它积聚道义力量，为推进全球治理的公平正义发出中国声音；它把中国发展融入世界发展，打造中国国际新形象。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逆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赵欢春（1971-），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南京 211815）。

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社会进程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也迎来了更多“成长中的烦恼”：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深入推进，我国面临着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期；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周边安全形势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① 赢得伟大斗争需要伟大战略的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顺应了这一时代诉求，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阐明这一构想战略意义，可以为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重要遵循。

一、举旗定向，应对变局，争取光明未来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斗争精神的实质就是人们在自觉观念的支配下创造历史。敢于斗争的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更是我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内核和最直观的体现。面对逆全球化的非理性浪潮，党领导人民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战略构想。这一构想体现了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对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应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2015MZD048）和一般项目“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研究”（15BKS08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

对。它立足当下，透析历史，关照未来，把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秩序的演化放在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客观逻辑中进行整体考量，把中华民族的复兴融入世界共享繁荣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格局。

1. 坚决抵制逆全球化思潮

近年来，随着欧美国家移民政策收紧、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长率下降等现象的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实际情况是：“全球化进程的动能正在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也将是一个创新、联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中国正在成长为新型全球化的塑造者。”^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前进的时代脉搏，高高举起反击逆全球化思潮的思想旗帜，在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全球化速率下降等挑战面前，彰显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定力来自对经济全球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总体性进程：“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 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③。英国学者卡尔·布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构建了全球化的分析模型，将国内市场保护与世界市场能量释放视为全球化市场的两极变量，解释了全球化的“钟摆效应”。美国学者乔万尼·阿瑞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一书中指出，生产、贸易、财政以及金融政策的阶段性扩张决定了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的总体进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我们有依据、有底气指出，所谓的“逆全球化”，不过是发生在欧美国家带有阶段性、地域性、周期性特点的现象，反映的恰恰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足，而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

实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是欧美国家试图按照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的方向重塑全球化。由欧美国家推动的全球化记录了资本对外殖民、黑奴贸易、金本位和美元霸权的黑暗历史。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④ 事实上，西方社会炮制的逆全球化思潮，图谋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强化西方大国的霸主地位。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冲突的角度看，逆全球化思潮是东西方文明和价值体系竞争的一个缩影。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跳出了西方媒体和思想界的议题设置，高高举起了“全球化”的思想旗帜，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中把稳方向，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勇立潮头。

2. 积极建构新型全球化格局

破旧是为了立新。当前，世界经济低迷风险叠加，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跨界蔓延，大国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全球贫富差距依然巨大。这些世界性问题表明，传统全球化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关口，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成为破茧之声。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钟摆效应”中难得的战略机遇，倡导新型全球化，议定新背景下的新规则，孵化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果，助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并惠及全球，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

① 《2016 浙江全球化发展报告》，http://www.xinhuanet.com/itown/2017-05/15/c_136284838.htm。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③ 参见《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10页。

④ 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致力于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化要求我们：以“创新驱动”筑造充满活力的增长模式，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滞缓的问题；以“协同联动”打造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打破目前全球各国发展失衡的问题；以“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搭建和巩固共商、共建的平台和机制；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弥补目前发展成果不能普及全民的困境^①。这些任务没有一项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迎接新挑战完成新任务，需要战略考量，更需要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新型全球化旨在解决全球治理的制度碎片化和机制失灵问题。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全球公共产品匮乏、全球共同利益分配不均等难题。与此同时，能源问题、食品安全、生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跨境耦合，而现有的应对这些难题的国际多边、双边框架以及联盟形式，却因为互不相容呈“碎片化”样式，致使国际社会各种风险累积，危机四伏。同时，我们看到，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安全、贸易和金融机制在应对全球危机时明显力不从心，国际秩序处于危险的边缘。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刻不容缓，全球治理规则亟待重塑。与经济组织中的个人最大限度追逐利益类似，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各个主体（包括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大多也倾向于最大限度追逐利益，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全球治理机制就会低效，甚至失效。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能够成为“思想信念的约束”，成为全球治理机制的黏合剂，破解传统全球化发展难题，构建新型全球化，从而使经济全球化更富有活力。

二、凝聚共识，提炼时代主题，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世界变局催生时代主题的转换。基于主权国家的现代世界体系始于17世纪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②。此后400年间，世界秩序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与重构：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的维也纳格局见证了欧洲反法同盟国实力的消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格局记录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贪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格局造就了美苏两级冷战对峙的态势。如果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冷战对峙告一段落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第一次重大转折，那么今天世界再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单极霸权盛极而衰，世界正从单极独霸秩序向全球合作共存的新秩序转型。尽管这一过程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但是这一趋势是不容置疑的。在全球秩序转型、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的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敢于接受时代挑战，勇于担当时代责任的良好意愿和务实作风。

1. 廓清历史迷雾，筑造“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势

我们相信，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时代的终结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建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秩序的开始。合作共赢是人类理性的选择。世界格局向全球合作共赢的新秩序转换，符合当代人共同利益的理性诉求。世界变局在向我们展示历史足迹的同时，也给我们诸多启迪：其一，霸权式扩张必然导致霸权衰落。冷战后美国走霸权式扩张之路，变本加厉穷兵黩武，严重透支了国家资源，军事力量优势实际效用在下降。经济上，金融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危机频发，实力损耗严重。

^① 参见《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10页。

^② 通常认为，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神权与政权分离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标志着现代基于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开端。

政治上，一向引以为傲的“民主价值观”和道德形象破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一个乱象丛生的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单独应对世界事务。历史事实证明，霸权道路非但不能将国家带上可持续的繁荣之路，反而会导致从繁荣走向衰落。其二，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威胁和挑战面前，世界往何处去，我们怎么办？这是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我们审时度势积极应对。显而易见，霸权主义已被时代抛弃，合作共赢才是唯一出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深度发展，使一国的安全和发展事务跨越地缘界限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问题。人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合作？是共同毁灭，还是共同发展？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结论显而易见，道路却不甚明朗。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顺应世界大势，在世界变局的历史机遇和重重迷雾中，提炼出“合作共赢”的时代要求，体现了中国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2. 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凝聚和平发展的世界共识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顺应和平与发展历史潮流，主动解答时代命题，努力展现时代担当，积极为世界和平发展凝聚共识。

历史上，人类出于对安全感的不懈追求，建构并推动人类合作形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在世界历史中群体合作的三种形态：以人与人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形态，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现代“虚幻共同体”形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愿景的未来“真正共同体”形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国家间交往”的历史就要向“全球交往”的历史演进了。马克思把这一进步的前景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我们距这一目标还很远，但今天的世界历史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则是无疑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前进趋势中，我们必须反思一个事实：对抗、冲突和战争在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战争伴随着原始共同体向奴隶制帝国和封建王朝的历史转型，也常常成为现代国家保障自身安全和利益、捍卫政治立场的最高斗争形式。俄国作家索科洛夫在《影响人类历史的100场战争》一书中记载了人类3000年来的著名战争^③。其中，以国家利益或名誉发起的局部战争、地区冲突、热战、冷战等对抗和冲突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迷雾和合作不确定性的历史现象。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驱散战争阴霾，构筑和平发展的世界共识。这一构想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一定能够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影响和召唤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战胜现在和未来的敌人，共筑世界和平。

三、积聚道义力量，崇尚公平正义，构筑全球治理新秩序

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合作范式是唯物史观对人类生存发展基本方式的概括。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共同体图景是人类从低级向高级、从蒙昧到文明接续发展的不可逆的过程。人类为了安全和发展形成了合作共同体，而当“合作创造了更大收益，却又因此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③ 参见〔俄〕索科洛夫：《影响人类历史的100场战争》，柳新军、彭文钊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年。

发分配不公而导致冲突。为了使合作变得稳定可靠，就需要把合作基因制度化”^①。鲍曼指出：“我们怀念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怀念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品质，但是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几乎不可能提供这种安全感，甚至更不愿意作出许诺。”^②在这个意义上，建构更高级别的合作平台实现更高层次的安全感就成为迫切需要。共同体是人们在—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的道义选择。不同于其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积聚道义力量，为推进全球治理的公平正义发出中国声音。

1. 破解合作悖论，揭示道义逻辑，打造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用基于道义价值的“人的世界性存在”和“世界利益的共享性”理念来破解合作悖论，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其逻辑是：用人类的“世界性”存在逻辑来拓展人类的“自然性”存在逻辑和“国家性”存在逻辑，从而在道义的层面上完成了人类存在方式的进化历程，亦即从自然的“个体形态”进化到“国家形态”再进化到“世界形态”。毫无疑问，人类的“世界性”存在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全球化阶段的必然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正是这一逻辑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反映，并在实践领域创造了全新的可能性。其价值预设是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的共享，其物质基础是“世界的唯一性”，即这是一个普遍—致的世界整体，在那里，不必设对立面，也不再需要敌人，只需要一个为世界利益着想的世界制度。

中美贸易战毫无疑问是美国基于自身的狭隘利益而挑起的大国争端，这一争端是我们当下必须直面的大国间“合作悖论”事件。要知道，贸易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之争，它往往会引发政治博弈继而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特别是“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更多的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一种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的国际政治行为。而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博弈”。客观上看，世界秩序在演化进程中，由“合作悖论”衍生的对抗、冲突和战争的历史从反面凸显了人类安全感诉求的道义理想。可以明确的是，战争不是天然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形式。跳出战争的魔咒，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生存命题。在此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目的在于积聚世界人民的道义力量，而不仅仅出于道义上的理想设计。其现实性在于，它能够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遏制战争冲动，引导各国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

2. 直面全球性难题，寻求全球治理新方案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没有超出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③在过去的300多年里，这个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霸权体系创造出了超过以往人类历史发展总和的巨大生产力。同时，这个霸权体系也备受挑战。困扰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如经济低迷、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恐怖事件、环境恶化、战争危险、军备竞赛等，单靠某一个国家是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挑战全球治理的公平正义。

探究全球治理失序的根源，我们可以从资本、制度和价值观三个角度入手。其一，资本增殖无序扩张是全球治理失序的物质根源。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它在逐利的过程中，进行着以牺牲人的发展和后发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资本扩张运动。它以经济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

①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和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9页。

②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③ 金民卿：《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时代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军事霸权等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扩张，加剧了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不公平性和不可持续性。其二，西方中心论是导致世界失序的制度根源。西方中心论把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在国际上推行“全球西方化”和世界的“资本主义化”^①，导致西亚、中东和北非等地区长期陷入动荡，由此产生的难民潮也终于拖累西方，被改造者和改造者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其三，自由主义是导致全球治理失序的价值观根源。自由主义鼓吹民主神话、宣扬市场万能。它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还通过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等形式输出意识形态，引起国际社会的动荡。

从根源上解决全球治理的失序问题，道义的力量必不可少。中国向世界发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要积聚道义力量，倡导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新路。为此，中国提出，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多领域合作，推动文明互鉴；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加强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迎挑战^②。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要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者、全球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将来也不会改变立场。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能够赢得越来越多世界人民的支持，积聚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的力量。

四、把中国融入世界，互利共赢谋发展，彰显中国国际新形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致力于把中国发展融入世界发展，旨在构建一个以“共在”为价值原则的制度体系。共在原则可以从普遍冲突发展出普遍合作，从而为克制人性的局限、化解冲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1. 通过价值建构，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作为一种新型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主张世界关系的普遍化，反对同质化。它把“家—国—世界”作为完整的非排他的分析单位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把思考世界秩序的重心落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上，这就超越了“家”“国”特殊利益最大化的狭隘计算。它把化解冲突的全部可能性都蕴含在关系的概念和方法论之中，致力于发展“关系理性”，限制“个人理性”。在国际交往实践中，中国反对“欧洲化”“美国化”，拒绝霸权原则，也不主张世界的“中国化”。毫无疑问，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践行新型世界观的积极尝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核心价值是优先保障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建构世界永久和平。它以“多样化框架”去兼容和协调各种异质价值观和文化，有效抑制互相冲突。它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灾难，使旨在促进各个国家永续发展的世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它着力解答那些在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不同的国家如何共存发展的问题，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观架构，促成国际合作。

2. 打造中国国际新形象，倡导世界共建共享美好未来

形象是指“一定主体基于其内在本质而表现出的外部状态和面貌，通过中介渠道的传输，由客

^① 傅莹：《全球变革与中国的角色》，《参考消息》2017年3月9日。

^② 参见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9页。

体接受而形成的关于主体面貌的总的感觉、印象、认知和判断”^①。依据这个定义，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的三大崭新形象。

一是紧跟世界潮流、立足中国发展、推进世界发展的改革开放形象。“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②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不仅顺应了中国人民要美好生活、要创新、要发展的历史要求，也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生活、要合作、要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给世界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从顺应世界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文件。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之一，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二是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安定团结、促进世界和平的合作共赢形象。合作共赢形象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形象。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步入低潮，但中国不断崛起。在这个新旧秩序更替的历史窗口期，我们在客观上处于各种矛盾的交汇期：在国际上，必然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主要攻击目标和遏制对象；在国内，面临着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础上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③ 这句话定位了新时代中国在世界总体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在这个世界上高高举起了合作共赢的思想旗帜。

三是携手世界人民、共促全球发展、有节制有担当的大国形象。自2008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④ 对于中国来说，挑战不在于如何进入世界舞台中央，而在于在这个进程中如何确定和阐述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目标诉求。中国必须以有节制、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出现，不能仅仅考虑由此带来的利益增加和权力扩大，而是必须更加主动地体现出自己的大国担当，成为世界上最被人倚重、最能解决问题的国家之一。我们不埋怨自己，不指责他人，不放弃信心，不逃避责任，携手世界人民一起来战胜困难，共促全球发展进步。

五、结 语

“花开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孕育于

① 李忠杰：《大要有大的样子——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设并以此纪念建党97周年》，http://news.china.com.cn/2018-06/25/content_53368722.htm。

② 《荀子·天论》，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4年，第2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④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历史关口，奠基于对历史规律把握、世界进步力量确立、有效地团结更多人的积极意愿之上，是中国智慧和世界历史进步潮流的时代融合，主张为调和国家关系、调解国际矛盾和解决复杂国际问题提供思想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自觉创造历史的能力、魄力与信心，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战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体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认同这一思想，并外化为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从而为新型全球化注入新动能。在世界人民努力破解全球化时代之谜、回答全球化时代之问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彰显了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 [2]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3] 王义桅：《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 [4]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
- [5] [美]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
- [6] 保建云：《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习近平国际战略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编辑：刘曙辉）

2020年《马克思主义研究》选题导引

为了使广大学者了解本刊明年重点关注的选题，现特推出2020年我刊选题导引，以供参考。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研究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的重大意义研究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4.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研究
5.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的方法论研究
6.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7.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研究——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8.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及其当代价值——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9. 当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特征和趋势研究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研究
11. 数字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1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坚守与创新
13. 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与规律研究
14. 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动态新趋势研究
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2019年11月